

# 穹顶之下的《活着之上》

李志雄,董琳钰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通过主人公聂致远从攻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到担任高校教师20余年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矛盾,探究了活着以及活着之外的人生意义。小说既是对物化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拷问,也是对物化世界的批判反抗。

**[关键词]** 《活着之上》;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物化时代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3-0067-05

## Under the Dome of *Beyond Living*

LI Zhixiong, DONG Lin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more than 20 years'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leading character Nie Zhiyuan who studied as a master, a doctoral candidate and then functioned as a college teacher, Yan Zhen's novel *Beyond Living* reveals the survival predicament and spiritual dilemma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and explores the life meaning of living and beyond living. The novel is a spiritual excruci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aterialized society, and also a criticism and revolt of the materialized world.

**Key words:** *Beyond Living*; intellectuals; survival predicament; materialized age

“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那个绝对更绝对。”<sup>[1]230</sup>这是人生的必选题,文中的聂致远无数次地思考这个问题,在生存和坚守良知之间摇摆,在活着和活着之上的边缘游走,在困境中举步维艰地前行,在现实与精神的撕扯中挣扎。内心有着文人的风骨与尊严,向往与执着,但在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时而竭力挣扎,时而无奈妥协,在挣扎与妥协当中循环往复,犹如困兽之斗般不死不休。在这样一个坚守与犹豫交锋的过程之中,探究活着以及活着之外的意义似乎显得格外有必要,尤其是对于身为知识分子的这类人。

### 一 活着之上的意义:本真自我的不懈追求

“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发达,在表面看来,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人是莫名其妙的生下来,无可奈何地活着,最后不知其所以然的死掉。”(南怀瑾语)诚然如此,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物质与精神拉锯的尴尬时代,无可奈何地活着,竭力追寻着活着之上的意义。也许是不甘心,也许是对现实的反抗突围,但更多地是对自我良知的坚守。古语云“好死不如赖活着”,

收稿日期:2016-01-05

作者简介:李志雄(1966-),男,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董琳钰(1990-),女,河南南阳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文艺评论。

似乎不管怎样,只要能生存下去就好。但是事实上,如果人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那无异于行尸走肉,在活着之外我们还要在自己渺小的生活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人生和意义世界,实现对真我价值的追求。出生而入死,是我们生命的自然运转规律,但不是我们人生精神感知层面上的归宿;人生的真正归宿,是向死而生,是我们灵魂与内在原始强力为了图存而发出的强烈震颤,这更是一种深沉而又古老的人类始祖之灵魂所发出的深情呼唤。

聂致远一次次在生存的悖论中徘徊,也曾想过屈从于现实,规避体制内的不合理抑或是默认其合理性,功利主义地或者实用主义地去出卖自己的良知和操守,但每当他想到曹雪芹、张载、王阳明等风骨气节文人的高风亮节,便观照自身,明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毅然决然地选择继续坚守自我的信念。聂致远的这种精神挣扎史正应了魏晋名士殷浩所言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sup>[2]</sup>,这里的“我”是指“真我”,是对本真自我的追求。这种追求没有所谓的本我和超我之分,因为最终都是指向对内心精神层面的要求,也都是站在庸俗现实生活的对立面而言的。作者安排聂致远百般波折之后最终评上了教授,无疑是对这种自我坚守的肯定,同时告诉我们要轻易屈从于现实,放弃自己的坚持。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坚守自我的意义,这种意义无疑是对自我活着之上的精神追求的认可和鼓励。

聂致远这类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和追求“真我”成为了作者笔下活着之上的实质意义,也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一种反思和重新定位,更是对体制内知识分子探索自身出路的一种形而上的价值导向。其价值的最终指向正如刘克邦在《自然抵达》中所暗示的那样,唤醒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和良心,进而呼吁其进行无声的抵抗和决绝的坚守,守望其神圣精神家园的净土,最终让灵魂有处安放。<sup>[3]</sup>

## 二 穹顶之下的实质:物化时代的话语权更迭

所谓“穹顶”,本是一种悬垂的半球体空间或面积,而在这里则是聂致远口中由金钱、权力、人脉所构建的巨大“关系网”。这张网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校和学术界同样不可避免,聂致

远等知识分子也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穹顶之下。按常理说,像聂致远这样一个学识渊博、笔耕不辍的知识分子发表学术论文、晋升职称等本该是一帆风顺的,但纵观他的经历,却是让人不胜唏嘘,着实太过曲折艰辛,本该水到渠成的事情实现起来竟然难如登天。不止聂致远是如此,小说中一个个为了编制、职称、科研项目等求告无门、百般算计的事例无一不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实力并不是硬道理,人脉、金钱、权力才更有话语权。

更让人震惊的是,基本上所有人都默认这样一种现实是理所当然的。所有人都把这种不正常当成了习以为常,继而让自己也成为这个现实的参与者和簇拥者,把明知不合理的事情推向合理化的方向,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这个受害者实质上正在致力于强化戕害自身的那股无形的力量。这些人似乎走进了鲁迅笔下所说的“无物之阵”一般,分明自己被一种敌对势力包围着,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分不清敌友,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无形”的“壁”,潜意识中其实已经成为了加害自己的帮凶。这样一种有悖常理的现象让深陷“无物之阵”的人披着随波逐流的外衣对丑陋黑暗的现状视若无睹,让诸多原本有人格操守的人开始把各种潜规则奉为圭臬。现代人面对社会的不合理现状,不是反思,而是深陷其中,进而成为其认同者和拥护者,这是何其悲哀的事情。我们不禁会思考,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学术圈的怪现象?

这种现实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其产生的温床,社会和时代出了问题。众所周知,我们早已进入了一个商品消费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社会,其实质则可以说是一个被“物”统治的时代,即人“使自己为了物的目的而与物联系在一起”<sup>[4]</sup>。诚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商品关系无处不在的社会里,哪里存在着商品经济,哪里就必然存在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作为经济的伴生物,意味着人类和其劳动对象之间发生了一种权力的转移,卢卡奇把它称之为“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物的特征,因而获得一种‘虚幻的客观性’,即一种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和包罗万象的自己发展的东西,以致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切痕迹都看不出来了。”<sup>[5]</sup>而齐美尔则将这种物化视为货币文化对整

体性社会生活的渗透与规划,其结果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sup>[6]</sup>这种物化的过程中,人类、思想、活动、关系等等,都变得抽象和类物化,人渐渐地丧失精神独立性,不断为物所奴役,不断地被异化。

整个社会进入了物化时代,文化自然而然地开始凸显出其拜物性特征。文化的拜物性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即学术的体制化和商业化,学术沦为体制下进行物物交换的商品。在小说中,发论文要有关系,要出版面费,评职称和争取科研项目要有关系,评优秀博士论文要送礼,几乎所有跟学术有关的事情都被金钱、权力和人脉所构建的巨大社会关系网所覆盖——这个庞大的关系网正是物化社会形态下的典型体现。学术圈事实上成了交易“学术”的市场,学术变得带有功利性和物质性,成为了物化时代的一种另类消费品,步入了商品化的进程。毫不讳言地说,学术的体制化和商业化从更深的意义层面揭示的是商品拜物教的负作用,是文化物化的典型体现,反映了商品化社会对文化造成的巨大冲击,最终导致了文化本身的颓败没落和人对文化本真追求的式微,继而让人走向了精神异化,社会也彻底失去救赎力量的根源。

此外,伴随着学术商业化而来的是学术话语权的更迭。学术的价值已经不能仅仅凭借其内在属性和意义去决定了,更重要的是由钱和权构建的关系网所决定。在学术圈乃至整个社会的场域中,话语权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更迭——因为在原来场域中有话语权的学术价值权威已经被更有话语权的权威——钱和权所替代了。这种话语权更迭在物化时代本就是无可厚非的,毫无疑问它也是造成这个时代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关键原因,但是一旦当其触及到了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和时代之声的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圈子之时,破坏力必然更甚于前。先是意味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与根性将会渐趋消逝,他们精神坚守的意义世界将会崩塌,沦为物化世界中不折不扣的“物”,其次则预示了潜在的文化没落危机,文化不再具有纯粹性和自律意识,只能成为一种基于某种目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存在。

具体到小说中,话语权的更迭指向的则是知识

分子在选择价值取向时趋向于认同新的话语权——钱和权,而放弃传统的价值取向——良知与操守。这种选择也许真的是被形势所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知识分子潜意识里自主的妥协与趋同。他们可以如先行者那般有风骨的选择抗争,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而是甘愿屈从。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入“无物之阵”一般,知识分子的这种趋同反过来又让拥有新话语权的钱和权力量愈加强大,这样一来,其话语权地位愈加稳固,主导力量愈加强大,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压制愈加激烈。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社会的精英分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精英文化的象征符号,可是连他们都让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无解的单循环困境之中,那么社会中其他人的生存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 三 活着之上与穹顶之下:主题和叙事的双重限度

文中有两件很有代表性的事,第一件事是聂致远评教授还差一篇权威刊物的文章,而他的大师兄周一凡恰好是权威刊物的副主编。此时刚好历史学院和该刊物合作,十万元版面费发四篇论文,聂致远本想借这个东风发论文,无奈得不到学校的支持名额,决定自己花钱发。于是便和师兄联系,师兄遂把版面费降到一万,最终由于文章外审过硬免版面费发了论文。文中是这么描述聂致远的感受的:“一万块钱是小事,可我凭借自己的水平发了这篇文章,那就不是小事。我找到了存在的感觉,感到了学术的温馨。”<sup>[1]272</sup>诚然,聂致远论文本身的扎实是得以发表的基本条件,但是试问,若非他师兄推荐,他的论文真的有机会见刊吗?学术的温馨之光当真的能够普照众人吗?聂致远竟然在这里找到了存在感,着实让人惊讶。难道他自我陶醉这种成就感的时候,不曾反思过那些文章比他写得好却无法发表的人该怎么去找寻存在感吗?

第二件事是在评教授的时候,无人支持的聂致远出人意料地挤掉了由院长和前校长分别支持的孟子云和肖忠祥,评上了教授。作者特意安排了一个人来交待原因,“评谁都不好,不和谐,卢校长就推了你,说到底还是你的材料更扎实一些。”<sup>[1]299</sup>如同发论文事件一样,材料扎实是基本条件,但是试问,如果没有这种权力角逐,孟肖二人的材料其实

也不比聂致远差多少,鹿死谁手真的尚未可知。作者安排了孟子云的嚎啕大哭和肖忠祥的突然昏厥这些丑态,无疑是在抨击权力机制下学术圈的黑暗,同时也在暗示聂致远的成功是理所当然似的。

这两件事,表面看来都是聂致远历经坎坷,最终凭借自己的实力得偿所愿的情节,作者原意是为了阐释主旨——知识分子的坚守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聂致远得偿所愿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他实质上也是利益角逐的受益者。纵然他并非刻意地操控和参与利益的角逐,纵然会有人以其实力过硬来为其喊冤辩护,但他确实获益,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虽然通篇都写了聂致远的文人风骨和操守,但是聂致远确实也有羡慕过那些有关系的人,也有过想找关系的想法,只是求告无门而已。换言之,不是他不想,只是他没有。若是用中国传统的好人有好报来解释聂致远的获益,则显得差强人意了些。常言道无巧不成书,但前提是那些巧合应该是有意味的、不漏痕迹的偶然性事件,若是被人看出了刻意的痕迹,那么小说的艺术性必然会大打折扣。

对小说而言,最明显的便是作者安排的这些出人意料而又“太过”情理之中的事件,活脱脱地让原本力透纸背刻画的风骨文人成为了学术体制化的受益者,这种自我相悖的情节安排无疑让其在叙述逻辑上有了无法规避的缺陷。正如评论家刘扬所说:“作者的用意原本是好的,是为了净化学术风气,但在这种为了写学术腐败而全景式罗列现象的叙事中,作者又太执着于塑造一个坚守精神与人格而不得的形象,因此充满了叙事上的话语龃龉与逻辑矛盾之处。当一个作家急于完成某种主题和传达某种声音的时候,艺术策略上的欠妥本身会大大减损小说动人之处。”<sup>[7]</sup>事实上反观整个文本,无论是老生常谈的理想让位于现实的故事重述,还是文中传统的托古述怀的叙事手法,作者所选择的这些传统叙事策略也都让这篇小说在叙事上缺乏了该有的张力。

由一个显而易见的受害者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受益者,看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作者就是这么让它顺理成章戏剧性地发生了。作者着力刻画了聂致远这样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文人形象,准确地说是一个活在当代体制化学术背景下

的孱弱而又坚强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安排了聂致远的成功,到底说明了什么呢?首先,毫无疑问是力证了风骨文人坚守自己良知和精神追求是有价值的,鼓励知识分子不要轻易妥协,只要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其次,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体制化学术现状的批判和对物化世界的艰难反抗。作者企图用生存在体制内的这样一位知识分子的遭遇来拷问这个物化世界,并且用聂致远的成功来回击物化世界对人精神的戕害。虽然这种回击不足以让金钱和权力编织的这张关系巨网支离破碎,但至少暗示了知识分子存在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坚定其进行坚守和抗争的信念。

最后,这恰恰揭示了作者的矛盾所在:风骨坚守者也是物化社会的受益者。明知物化世界是造成精神压迫的根本原因,期待知识分子坚守自我,与之抗争,却还是安排主人公因物化世界不合理的规则而得益。既想对抗这个物欲社会的现状,又默认其现状存在的合理性。作者这样的叙事安排意图何在?是想要告诉我们无论怎样都无法突围这张由权力和金钱构建的巨大关系网,不如顺其自然让位于新的话语权主宰者吗?还是连他自己都如同文中那些人物一般,默认了不合理为合理的存在,默认了风骨文人的坚守只是乌托邦而已,最终是指向了虚幻。反过来,若是承认文人的坚守只是杯水车薪的乌托邦而已,作者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先行者们来鼓励主人公的反抗呢?作者着力刻画聂致远的心灵挣扎历程,最终却如此安排他的成功,难道是为了告诉我们聂致远的挣扎只是徒劳的作秀吗?当然不可能如此。只能说这是作者叙事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创作意图与叙事建构的背离,也恰恰说明了作者在主题和叙事上存在的双重限度。

阎真说:“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是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平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人总是要活着,然后才能追求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sup>[8]</sup>这是他在写《活着之上》时的思考,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创作初衷——致力于在活着和活着之上寻求一种总体的平衡。可是我们纵观整部小说,阎真安排聂

致远的一次次挣扎和妥协、打倒潜规则和被打倒的过程,已经在潜意识里把活着和活着之上放置在了一个对立面,似乎要想活得好就要把自己活着之上的精神追求暂时搁置一旁,而要想获得活着之上的意义价值就注定活不好。毋庸置疑,阎真的原本写作意图与小说的实际叙事意义出现了不一致,甚至说是相悖的,这似乎也是阎真小说一以贯之的创作缺失。

回顾阎真的作品,从早期的《沧浪之水》中对主人公暧昧的同情态度,到如今《活着之上》里安排主人公自我辩解式的叙事逻辑,作者似乎都在试图实现所谓的对立中的某种“平衡”。可能这正是作者本人理想化的现实生存方式,固然无可厚非,但是为了刻意实现这种平衡最终却把小说思想和叙事指向一种矛盾,似乎有些得不偿失,窃以为恰恰正是这种刻意追求的所谓平衡限制了他小说的思想和叙事的深度。在小说结束的部分,作者强调了“这是没有悲剧感的悲剧”<sup>[1]309</sup>。所谓没有悲剧感的悲剧,还是悲剧吗?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身为知识分子深深的无力感,一种面对无法突围的现实困境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无疑也正是导致作者无法突破小说主题限度的重要原因。

一言以蔽之,《活着之上》的精神叙事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是对物化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拷问,也是对物化世界的批判和反抗。虽然作者在叙事和思想上存在一定的限度,但是并未削弱其思想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力度,还是很值得我们去阅读并思考小说的内涵意义的。在书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个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时代,芸芸众生再难产生令人高山仰止的灵魂;这是一个平民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小人物难免卑微却仰望星空。你不曾经历,却正如你经历……”<sup>[1]</sup>观人推己,每个人身上都有聂致远的影子,都在做生

存与良知哪个更绝对这道必选题,如果不想不知其所以然地终结这一生,便需要明确自身真我的追求。我们都是凡尘俗人而已,无法企及大师的高度成为文化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坚守做人的底线,用纯洁的灵魂去效仿圣人,去仰望星空。正如文中聂致远所思考的那样:“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否定了这种意义,一个人就成为了弃儿,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sup>[1]309</sup>换言之,若不想让自己的心灵流离失所,我们至少也要做到心安理得,知行合一,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心,大抵这便是普通人活着之上的意义所在。

#### 参考文献:

- [1] 阎真. 活着之上[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 [2] 柳士镇,钱南秀.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世说新语选译[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17.
- [3] 刘哈,龚芳敏. 无声的抵抗与决绝的坚守:评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84.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6.
- [5]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译. 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7-148.
- [6] 齐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顾仁明,译. 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8.
- [7] 刘杨. 思想与叙事的双重限度:评阎真新作《活着之上》[N]. 文学报,2015-01-29(21).
- [8] 阎真. 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N]. 文艺报,2015-03-13(2).

责任编辑:黄声波